

“烧香拜树”的考生家长输不起



评论员观察

把希望寄托于迷信活动,除了容易让人放弃奋斗之外,根本没有什么效果,有意识把孩子送进“毛坦厂”的家长,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。如此还求神拜物,无非说明一点,为助孩子成功,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。

5月21日,也就是2016年高考前的最后一个阴历十五,被誉为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”的毛坦厂中学外,数百陪读家长冒雨涌入校外的一处窄巷中,他们聚集在一棵被誉为神树的柳树旁抢拜“头香”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祈福孩子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。

翻看以往的新闻才知,这“烧香拜树”竟已流行多年,去年还险些闹出火灾。家长的一片苦心显而易见,只是不知道校内苦读的学生得知后,会有怎样一番感想。一分浓浓的爱意背后,更多的恐怕是倍增的压力,若是成绩不理想,哪还有什么脸面来面对为自己付出如此之多的家长呢?

一边把孩子送到“军事化管理”的“高考工厂”,一边又求神拜物,盼子女成才的那分迫切,已然让一些人失了分寸。仔细想来,这些若是有用,

何必让孩子在“工厂”里受苦?若是拜就考不上,那些家里人没赶上“头香”的孩子,干脆就不用苦读了。显然,把希望寄托于迷信活动,除了容易让人放弃奋斗之外,根本没有什么效果,有意识把孩子送进“毛坦厂”的家长,不可能不懂这个道理。如此还求神拜物,无非说明一点,为助孩子成功,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。

为子女付出,其心可鉴,烧了“头香”的家长算是了了一桩心事,可带给孩子的又是什么呢?一来无形中告诉孩子,高考的重要性非比寻常,不然家长也不会“无所不用其极”;二来则暗示孩子,香也烧了树也拜了,家长能做的都做到了,再考不好就只能怪自己了。就算是烧完香的家长,告诉孩子“上面”全打点好了,让孩子安心复习考试,可他们真的能安心吗?孩子们更会认准

一个理——高考是一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“战斗”。

那么问题就来了,考试成绩总是会受各种因素所影响,一旦真的失败了,孩子们有能力去面对吗?要知道,对于成功的执着,已经把考生家长打造成了最不好惹的一群人。高考期间,他们能让城市交通为之改变,就连身处扰民漩涡却能岿然不动的广场舞大妈,也会自觉地收敛锋芒。求胜的心理越是所向披靡,传达给孩子的就越是“不能失败”的心理暗示。此时,为考试排除干扰因素的努力,也都变成了考生身上的压力。

的确,很多时候需要看重得失,但把得失看得太重,没学会如何面对失败,就等于钻进了死胡同。毕竟,相对于漫长人生而言,高考只是阶段性的总结,甚至只是迈入社会前的起跑线,一场考试再成功,

也不如拥有坦然看待得失的健康心理。所以人们常常感到惋惜,每年高考发榜之后,总有失败者放弃生命,就算是成功进入名校,也有人因为适应不了身边“学霸”如云,放弃学业自暴自弃。从长远来看,健全的人格要比一时成功更重要,更何况,如今的社会早已不是一考定终身了,未来有无限的可能,有无数的机遇。

犹记得去年高考之后,舆论的焦点瞄准“状元”之时,马云写了一篇给失意考生的信,用自身的经历去鼓励他们振作起来。彼时这封信的广为流传恰恰说明了一点,信中看似最平常不过的“失败教育”在现实中是缺失的。就像那些冒雨烧香拜树的家长,他们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做不到的地方,他们要为孩子取胜穷尽所有的可能,哪怕明知无用也在所不辞。

公民论坛

依法选贤任能,应赛马而非相马

吴元中

浙江省义乌市近日向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的1名博士和12名硕士研究生发出了选聘挂职工作的函件。根据相关到岗方案,选调工作满3年后考核优秀的,可担任义乌市属国有企业副总或镇街、机关部门副科级职务等。义乌市的选调对象不仅限于两校全日制应届硕士、博士研究生,还要求其大学本科必须为211、985高校。(5月2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该消息传出后,引起了是否涉嫌学历歧视和是否突破了“凡进必考”规定的质疑。现代社会选才用人之所以通过公平公开的程序,而不是采取伯乐相马方式,不仅在于“相马”远不如“赛马”可靠,还在于“相马者”难免会有随意性或主观偏见。所以,公务员法

明确规定,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,采取公开考试办法,且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进行。即便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,可以简化程序或者采用其他测评办法,也需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。

无可否认的是,从在校学生中招录公务员,即使有意培养成骨干,按照公务员法规定也应统一考试选录。尤其是,13名选调生中有12名是硕士生,纵然他们出身于著名的高等学府,却谈不上是高端人才,应与其他硕士生、博士生一同走统一考试路径,而非走单独的“高层次人才”引进之路。由此看来,义乌市的做法涉嫌违反公务员法规定。

非但如此,把选拔对象限于两所高校,剥夺了其他学校

学生的机会,还涉及歧视问题。教育法就有明确规定,受教育者在入学、升学、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。不运用科学标准进行公平选拔,而是武断地限定选拔对象,就是歧视的表现,与广纳人才的要求背道而驰。至于不是给两校所有研究生一样的机会,而是进一步把选拔对象的本科就读学校限定在211、985高校,更是赤裸裸的歧视。这种唯出身是举的做法,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。

不能不说的是,政府作为法律执行者和社会的引领者,其行为对社会具有风向标作用。如果政府不把法律当回事,带头违法,就会上行下效,老百姓也不会认真守法。如果政府奉行歧视政策,缺乏平等观念,社会上也会充满歧视,到处是偏见。

1400万买70万卖,政府回购太任性

舒圣祥

1400万元回购的设备只拍出70万元!近日,武汉市武昌区整治非法码头,决定对13个非法码头、9个砂场、4个渣土场进行全部取缔和清理。通过测量、评估和审计,对9家民营非法砂场老板共补偿1200万元。由于砂场老板的趸船无法迁移,政府出资花1400万元回购了19艘趸船和7个浮吊。考虑这些趸船无法迁移,也无法使用,还要雇人看管,政府于是公开拍卖,起拍价是67万元,最终以70万元成交。(5月22日《工人日报》)

左手1400万元买进,右手70万元卖出,再家大业大,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这桩“买卖”亏得这么惨,到底是因为缺少买卖经验,还是因为利益输送,暂且不得而知,但至少说明官员“做生意”的确很低效。在相关报道中,这些民营

砂场被冠以“非法”之名,因“国家及省市文件精神”而必须取缔。这里需要厘清的是,这些砂场真的非法吗?如果非法,为何之前一直未被严格执法?如果非法,又为何会有补偿?比如强拆违建,是没有补偿的。最搞不明白的是,1200万元到底补偿的是什么,为什么还要额外高价回购趸船和设备?如果说1200万元补偿是明补,1400万元回购是否暗补?

公众对于悬殊的价差很愤怒,可事实上这价差很可能只是突破既定政策的“变通做法”,目的是要让江滩整治的规定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完成。换言之,江滩整治在官员政绩簿上的高效,是以撒钱作为代价的。如果是正常的执法行为,那么在1200万元补偿之外,这些趸船和设备根本不该由政府部门来回购。相反,那是砂场老板的私人财

产,如何处置以及能卖多少钱都是其私事,没必要由政府部门买了然后再卖。

政府部门自身用不着也无法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趸船和设备,居然也能成为政府回购的标的!相比1300多万元瞬间消失的价差,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,其本质是政府回购的滥用。笔者很想知道,当地回购这批趸船和设备的依据是什么?一句“砂场老板的趸船无法迁移”可以成为政府回购的理由吗?如果这个理由成立,市场上有问题的商品、卖不掉的,是否都该由政府部门包圆儿?

所以,真问题不是1300多万元在一进一出之间打了水漂,而是政府回购因缺少约束而被严重滥用,甚至已经成了一个筐,想达成什么政绩目标,都可以往里装。

投稿信箱:qilupinglun@sina.com

高速公路收费,别老盯着小账

一家之言

晏扬

刚刚过去的周末,有两个省份传出降低高速公路收费的消息:一是,从6月1日起,湖北省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将总体降低10%左右;二是,山西省确定,在政府还贷高速公路上实行货车大幅优惠减费政策,优惠期暂定为一年。

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几何,国家并无统一规定,由各省物价部门确定。如此,不仅各省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有差异,即使在一省之内,不同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也可能有所不同。至于收费标准是高是低,则往往公说婆说,莫衷一是——车主大多觉得偏高,货车司机更是满腹牢骚;公路经营方则大喊亏本,不时要求提高标准、延长收费;地方政府则夹在中间,左右为难。

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是降是升,关键要看怎样算账、算什么账。如果只盯着高速公路本身的收入和支出,如果将高速公路当成赚钱机器而忽视其公益属性,那么对于经营者而言,收费标准当然越高越好,只有涨价的冲动,没有降价的道理。而如果着眼于高速公路在社会经

济活动中所扮演的“大动脉”角色,着眼于它本该姓“公”而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,或者着眼于政府向车主收取这税那费后本该承担的公共责任,那么就不能让高速公路异化为赚钱机器,就该尽可能降低收费标准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公众。

换言之,高速公路收支情况如何,这是一笔要算清楚的账,但还有更大的账需要政府心中有数,那就是经济效益的账、社会效益的账。湖北、山西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,预计一年将分别减少收费18亿元、16亿元,这是公路经营方的损失,同时也意味着人们的通行成本降低,企业的物流成本降低,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远高于十多亿元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:高速公路降低收费后,可能让更多人乐意驾车出游,旅游要买门票,要吃饭、住宿、购物,车主省了10元过路费,却可能增加了上千元开支。我们总说要拉动内需,内需不就是这样拉动的吗?

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、企业普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,更需要以降费措施疏通高速公路“大动脉”,以减轻企业和车主的负担,让货物更加自由地流通,让人们更加自由地出行,这是必须算明白的“大账”。

媒体视点

“十年不发论文”弥足珍贵是宽容

韩春雨,一个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教授,十年没有发表文章,却一鸣惊人地发表了一项“诺贝尔级”的实验成果。韩春雨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,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。

韩本人甘于平淡,难能可贵,而学校对他的宽容更难能可贵。十年的时间里,一些大学校长都换了好几茬了,可河北的这所大学却能一直坚持下来,从未给过他诸如发表论文篇数以及评职称之类的压力,让他有条件泡在实验室专注于实验本身,这就不是一个宽容所能解释的。很多学校别说十年,一年都未必

等得了,一个十年出不了成果的科学家,可能早已经被遗忘在角落里了。

科研是件严肃认真的事,但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,功利的色彩越来越浓厚,容易出成果的领域人满为患,而真正能决定一个国家科研水准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乏人问津。而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研究,应用科学也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。

十年不发论文的宽容里必然有一套做法,它在量的累积和质的飞跃、在短期的成果和长期的成就之间取得了平衡。愿意在这样的事上做个尝试当然是有风险的,你得做好出了什么成果的准备。所以,与其去羡慕别人手里的好牌、红人,不如多想想自己的短视和功利。(摘自《钱江晚报》,作者高路)